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的仁道： 從文化與倫理看病毒疫情之啟示 The Dao of Benevolenc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velation from Cultur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李瑞全

Lee Shui Chuen

摘要 Abstract

由於新冠病毒的特性和難以防堵，新冠肺炎病毒很快成為全球性的流行病。而在此疫情中，受到感染和死亡的地區與人數急升，不但造成全球性的恐慌，同時產生許多心理、生活和

李瑞全，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台灣中壢市。

Lee Shui Chue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Taiwan.

《中外醫學哲學》XVIII:1 (2020 年)：頁 27-4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1 (2020), pp. 27-48.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文化上的嚴重問題。本文從倫理與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精神，檢討我們與此病毒共存時，如何調整我們的生活與價值，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觀念，以減輕或免除由此嚴峻疫情所受到的個人與社會的創傷和後遺症。本文分析了在地球村的緊密關係之下，我們必須保持有效的防疫工作才可以開封和進行經濟生產、物品流通，否則會在目前和日後不斷發生重覆的社區感染。人類必須團結互助、共同承擔和接受各種不便，互讓互諒、助人助己，才能夠平安渡過此一巨大災難。

公共衛生的防疫工作是一涉及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的嚴重的道德兩難的課題。在防疫上，我們的個人行動實涉及他人的生命安全與權益，我們必須放棄以個人自由權利為優先的觀點，採取在生活共同體中的仁愛與對他人的苦難所具有的同情共感的自我要求，以共同義務與關懷為主，這實是一「為己為人」的雙重義務，在疫情流行中，更需要發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仁愛精神；在工作上必謹守敬慎原則，超前部署防疫工作，防範醫療體崩潰，在疫情的政策要公開、透明、問責、方可望全民共同努力，共渡難關，實現「養生送死無憾」的人生願望。

在疫情中，家人的互相照護不但是生活上也是情感上的最重要的支持和解慰，社會和政府也必須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醫療資源的支助，以及截斷政治干涉，讓專家們進行公開的宣導工作、病情教育、回應疑難等，使社會、家庭和個人都得到支援和共識。病毒的傷害無國界，是我們的共同敵人，防疫的工作也無國界，人類必須有跨國家和跨民族的一體同仁的意識，實現互愛互助，不但救助社群中的脆弱者，也要救助落後的國家地區的人們。我們要領取這次教訓，建立真確的疫情訊息分享的平台，建立全球的病毒研究的規範、合符嚴格要求的病毒研究室，拒絕利用病毒研究為生化與戰爭的工具。在疫情

中可以推進世界和平，最後可以從病毒了解生命，在疫情中發揚倫理與文化的價值。

The special properties of the new Covid-19 virus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and it very quickly became a pandemic. The numbers of infected and deaths have increased so fast that it has incited a global panic and caused serious worldwide psychological, day-to-day, and cultural problems. This paper adopts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living with the virus and to explore how to adapt our values and way of living to mitigate or eliminate personal and social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this serious time. In this paper, I point out that as we live in a close-knit global village, we need an effective policy to keep the pandemic at bay before we can remove inter-city and international barriers to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 flow of economic products. Otherwise, we may—and in fact have had—continuous repeated infections. People must develop global solidarity based o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social love to share our responsibilities and burdens, and to help our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in this terrifying pandemic.

Public health pandemic prevention is a job involving a moral dilemma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ublic safety. Because our preventative actions involve the lives of others, we must abandon prioritizing our personal rights and adopt the principles of benevolence and empathy toward others, taking our common responsibility and care toward others as our main basis of action. This principle also applies to us: benevolence needs to be extended from our family members to everyone else. We have to put precautionary principles into action in our prevention, publicit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efforts to overcome the pandemic.

Family members are essential, as they provide both physic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during the pandemic. Society and governments have to provide the means to live as well as medical support,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must be curbed so that medical professionals can take the lead on public interactions, education, and interviews to enable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y to build a consensus on the issues and policies of prevention. Our common enemy is the virus, which assaults human health indiscriminately. We need to help our people as well as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society's most vulnerable. We must learn from this calamity and build a platform to share information, establish norms regulating virus studies, enact rigorous regulations for safety in

virus research laboratories, and reject using research results for chemical warfare. We hope this pandemic can bring about world peace as we learn to better our lives and further our eth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關鍵字】 全球大流行 新冠病毒 防疫工作 儒家倫理
仁愛原則

Keywords: pandemic, Covid-19,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onfucian ethics,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引言：瘟疫下的人間社會

瘟疫是那種人類對它完全無知，無法救治，而且以極高的速度鋪天蓋地而來，又極為嚴重且致命的病症。在人類歷史上，瘟疫比戰爭殺死的人超出極多。¹而且瘟疫不分人種、性別、階級、老幼，都一律殺無赦。而且由於通常在數日間即可以死人無數，而且還在不斷急劇增加中，以至一村一族、一城一鎮寂滅為止。它似乎無所不在，絕大多數的人只能無奈，以至絕望地等待它來到自己身上。因此，能逃避的人即馬上逃避到與世隔絕的城堡，只保護自己和家人。當然這只能是極少數有財有勢的人或家庭才能有可逃的地方，絕大部份的人根本無路可逃。在大難臨頭之際，為了生存與避禍，人際關係變得極度惡化，人人變成極度的不信任 and 互相攻擊，以致落井下石，見死不救。許多日常應負責任的人不再負責任，醫師、護理、神職、政府人員等等，都會放棄職守，以各種藉口和方式逃避自己應負的專業和專職的責任，甚致攻擊病人、排擠家屬，可謂無能又冷血。面對瘟疫，人類只餘下恐懼：不知如何面對惡疾與死亡。

在不遠之前的一百年前，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同時正有一人類與病毒的巨大戰爭在進行，而這一場戰爭比第一次世界

(1) 西方歷史上的黑死病二十世紀的流感，感染與死亡人數都極為龐大。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瘟疫」，名為「傷寒」，發生在三國時代，據一估計，當時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人。

大戰死亡的人更多。這就是從 1918 年到 1920 年發生的所謂「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後來世界衛生組織改名為「1918 年流感」(1918 flu pandemic)。這個病毒之所以為人所知是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西班牙並沒有被捲入，因此不像英美等國不准報導，因而當西班牙繼美法德等參戰國發生大流行疫情之後，不幸被傳入而發生大量的感染和死亡，因而被廣泛報導，被訂名為「西班牙流感」，世人以為是由西班牙開始的病毒。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此病毒可追溯到美國一個小鎮，但也有認為遠在 1917 年已有中國勞工染疾，傳到西方，云云。由於當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的各國政府無暇也不願正面處理，因此，不但禁止報導，醫療統計數字也不詳，落後國家和地區的疫情更無法統計，都只是事後的估算。一般接受的估計是有 5 億人受感染，5 千萬人死亡，也有認為接近一億人死亡。這一次疫情被埋沒在人禍的大戰之中。

這種巨大的瘟疫，不斷發生在人類歷史中，不分中外，不分地區或人種。而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發的地區是在武漢。因此，最初被稱為「武漢病毒」，為了避免產生對地區和當地人的歧視或污衊，後來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訂名為“2019-nCoV”，後又更名為“Covid 19”，一般中譯為「新冠病毒」，正規的譯法應是「2019 年冠狀病毒」，是人類所確認的第七種冠狀病毒。一如既往，我們對於這一新型病毒一無所知，它在何時何地產生，源頭何來，是出自研究機關的人工產品還是自然的演化等等，實不容易追查出來。這恐怕有待專家們日後去追尋才能知道究竟，但最後可能還是難以了知，也就是不了了之。

這次全球性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先從武漢爆發，最後由於人傳人的快速發展，一個月後即已蔓延到全中國和周邊國家，做成武漢和受感染的城市 and 鄉鎮都被封城。但此時病毒已傳到東南亞，韓國、日本等地，也已開始大量的社群感染，而有不得不封國封城的情況。不久之後，病毒更隨國際交通而通過陸路和航空跨過大海，再傳到美國、歐洲和中東等地，釀成全球性大流行。

目前正慢慢流傳到更遠的南美、非洲和印度，以及一些比較落後和與世界交流不多的地區。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已有超過 1 千萬人感染（確診），50 萬人死亡。雖然在亞洲、北美和歐洲開始減緩，但是，在南美、印度和非洲，以及較落後地區，仍然在飆升之中，總體數字仍然在上升，尚未見停止。更由於疫情使各國近半年來，封國封城使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和人民受到隔離限制之苦，各國不得不在疫情稍緩即要逐步解封。但由於第一波的社區感染情況嚴重，病毒的傳播沒法完全斷根，因此必有第二波感染的出現。因而又有解封的城市要再度封閉。這一情況恐怕會是全球不斷重覆的現象。是以，「2019 冠狀病毒」的疫情最後會如何發展與終結，人類是否能找到疫苗與治療藥物，目前實難以預測。我們可能要與病毒並存，或等待它自然消失，前景實尚未可知。

這一病毒的傳染特性是潛伏期較其他同類的新冠病毒，如 SARS 或 MERS 等更長，但殺傷力較輕一些。所以，通常帶原者尚未知自己染病，卻已傳染了不少接觸過的人。因此，當染病的人大量湧現時，它已傳播很廣很遠，實已有更大量的感染者潛伏在社區之中，眼前所見實只是冰山一角。疫情在幾日之間即不斷大爆發，病人更大量地湧現。一時之間，醫護人員和病床藥物，以至保護器具都遠遠不足，剎時即沖垮任何社會的醫療體制，更由於重覆感染，釀成大量的人傳人的社區感染。即使以美國、德、法等這些具有先進和優良醫藥體制的國家，其醫療物資都遠不足以應付，而只能看著感染與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束手無策。除了這一病毒的傳染特性之外，這一病毒的傳播與感染，以至死亡人數，都與地方的文化、宗教和倫理價值的特性有一定的關係。例如，伊朗的傳染突然暴增，南韓的宗教社群的大量感染，因而造成不可控的社區感染，都與當地的宗教的態度有關。西方國家一般認為有病才需要戴口罩，而且認為口罩對防止病毒傳播是無助的，甚至因而指控戴口罩的亞裔人士為傳播者，而加以攻擊和歧視。而英美等民主國家尊重個人的自由自主權利，政府不能也不

願強制人們戴口罩，因此，西方社會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戴口罩，讓病毒如入無人之境，數日之間即出現巨量確診。但遭受過新冠病毒肆虐的香港、澳門與台灣人民則多自動戴口罩，而這些地區的專家對近十年來各種新的疫症也有相當的了解和應對的經驗，因而對防堵疫情效果極佳，是現在全球少數仍然沒有真正或嚴重社區感染的地方。在疫情之中，不同文化與發展程度的社會卻有多種不同或相反的回應和後果。據一些調查統計，發展中國家由於被限制外出，以至缺少工作而停留在家，據此而會有增加人口生殖的後果，而西方國家的人則多會推遲生育計劃，人口反而會減少。這兩者都會造成對國家人口增減的後果，也會形成日後社會結構，包括人力、經濟與社會制度的改變。

此一疫症所造成的傷害，目前除了西班牙流感之外，在確診和死亡人數上都已超過所有歷史上發生的瘟疫。但由於疫情尚在擴散之中，最後的感染和死亡人數仍然很有可能超越西班牙流感。而此一疫情不但產生嚴重的死亡哀痛的經驗，也已產生許多嚴重的心理與生活的創傷。不少家庭都有親人由於救治失敗，或竟完全沒有藥物與醫護救治而死亡，以至由於要隔離而孤獨去世，親人也無法道別。亞裔人士也由於與初發病情的疫區有關係，在國內外都會受到排擠與歧視。人們在被強制隔離中不但感到恐懼與彷徨，亦變成受困囚牢與無法與人交流以至說話溝通，也無法出外活動和工作，因而增加了許多抑鬱等心理創傷，憤怒挫折的情緒等等。因此，不但病毒使人的身體生理受到嚴重傷害，在疫情之中，以至疫情之後，都有大量的恐懼與死亡、心理與群體、交往與團結的問題，有待我們正面回應和解決。這與每個地區的宗教、倫理與文化傳統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以下，主要由儒家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角度來反思和分析此一疫情中所涉及的價值和行動表現，以及傳統的文化與哲學如何能有助我們克服這一疫症所帶來的各方面的負面的影響，以及我們應如何團結，合力以赴，發揮人性人道，共渡此難。

一、新冠病毒疫情之發展與人類新的生活方式

這次疫症不但造成嚴重的病情和死亡，而且由於它的尚未確知而又高度感染的傳染性，使我們不能忽視。更由於目前和可見的時日中，我們都不會有確實有效的疫苗和治療藥物，因此，我們必須有長期與此病毒共存的心理預備和安排。由於世界各國都爆發過社群感染，而且病毒仍然在各地傳播，而我們也沒有辦法長期完全關閉邊境而必須解封。因此，跨區跨國的感染在短期內是無法消除的，事實上，第二波的感染實際上也已在美、德、法等國家開始了。由於不能消除第二波，第三波的重覆感染，沒有任何社區或國家可以在不用防堵之下重開社會交流的活動。不但個人之社交活動難以避免有感染的風險，如在工作場所、營業、商場、餐館或美食廣場交接和吃飯，等等；在國際交流上，許多重要的社交活動難以避免是在人多而密閉的空間中進行，如在飛機、旅館、商業活動中心等高風險場所。如何與此病毒共同生活而避免感染，將是我們未來不短的時間內——也許是長時間之內，我們必須考量的共存的生活方式。而且，由於我們已現實地生活在一共同的地球村之中，與病毒共存將是人類所必須共同採取的生活方式，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類將無法安穩地生存下去。

我們可以分別就個人起居的社區生活與大社會和跨國來往活動來說明其中的問題。在個人起居生活與社群交往方面，由於減少外出，家人自有更多密切接觸的時間，這自是培養親子關係最好的機會。但據外國的一些報導也有因長時間局處於一個狹小空間而產生更多的磨擦與衝突，家暴也增加了。如何調整共同生活的節目和身心的安頓，也是需要關注的。這時候，同情共感的互讓互諒與和諧共處，互相支援，應是最能消除因坐困愁城而來的抑悶與挫折感受。如何使居家生活更人性和更有文化意義是未來的健康生活重要的一環。公共團體和政府應贊助和多製作讓人開懷、一家同樂的影視節目，如以戲劇發揚傳統文化的美和價值，

以多樣化和有趣的形式推廣防堵疫情的方法，是舒緩人民心智情感、促進社會團結的重要防疫工作和新的生活方式。

由於社會的經濟生產和生活不可能長期停頓，如何在疫情尚未完結的時候，重新展開工商業的營運與工作，實是一嚴重的道德兩難的困境。長期缺乏工作與生產，不但各種工商業和社會制度會崩塌，個人和家庭的生活開支短缺，以至生活物品匱乏而又漲價，將使一般人，特別是中低下階層的生活更艱苦和難以為繼，必定產生更多的家庭和社會悲劇。因此，在開封與復工的過程中，不但要繼續做好防疫工作，也要調整生產線和上下班工作的安排，使社會經濟運作可以安全地進行，否則必定引來第二波、第三波的重新感染，又必回復到封廠封城的死巷，傷害更多。此如近日美、德多國的困境。因此，在公共安全與社會經濟生活都必須在合理的風險評估之下，才可以進行開封。此一歷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會是經年累月中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在此，守住謹慎原則，保持合理的防堵安排，以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仁愛精神，體認和接受各種不方便或困阻，仍然積極地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等衛生和防堵工作，是我們不可隨意逾越的共同防線。我們不但要全力配合防疫工作，也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最有效的生產，避免更多的感染和生命的犧牲，方真能保障社會的物品供應無缺，合理健康的生活才可以持續。否則，瘟疫的傷害只會擴大，人間悲劇難了。

綜言之，在當今如此的一個頻繁交流的地球村的共同生活之中，我們不可能苟幸自己的家園免受疫情侵襲。藏在任何角落的病毒都有可能再次引發全球性的流行病出現。任何國家地區或個人都不能免除此一風險，因此，我們必須把世界每一偏遠地區都視為我們自己家的後園，都是不能忽視的生活共同體的一分子。在真正滅除每一角落的病毒感染之前，我們都不能免於與病毒共存。我們也必須以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對於落後貧困地區的同胞都要予以優先的救助，

這不但體現我們本有的「仁心」而行，也同時是「助人助己」、「助己助人」的不可分割的團結博愛的精神表現。這是保障我們能與病毒共同生存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

二、在仁愛關係下的公共衛生之基本倫理規範

雖然西方倫理學與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也認同倫理或道德原則是一理性的要求，即具有普遍意義與一視同仁的要求，但基本上仍是以個體為中心，只由個體之權益伸展的方式以建立對他人同等權益的同等重視，但不必是出於親近與親愛的原因。當然，西方人也常會有對他人的無條件的和愛心的救助，無私的奉獻。這自也是西方人特別是在基督教推崇「主內一家」，與佛家之「同體大悲」所常有的表現，確是可以促使我們更進一步表現我們的仁愛於他人。但西方人卻不必認為解除他人的災難是自己的責任。若以儒家的「同情共感」與由此衍生的「仁者與天萬物為一體」的原則²，我們是有道德的責任推廣我們的仁心之關懷，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發揮和回應我們對其他人的苦難的感同而有的自我要求，或自願自加的義務（如同救助即將掉落深井被淹死的小孩的惻隱之心的呼召），去幫助有需要救助的人。我們在此要進一步深化此一仁愛原則，建立在地球村共同生活中所必須要遵從的公共衛生的倫理原則，真正履行此中的道德責任與義務的要求，方可能免於為疫症所摧殘，而實現我們「養生送死無憾」的願望。

由於流行性的疫症之傳染是涉及其他人的安全或傷害的嚴重病症，這是一類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和私隱有所衝突的「道德

(2) 孔子提出「仁」作為人之為人的價值所在，此概念實以人心之「同情共感」的「仁心」表現為核心，詳論請參見李瑞全 2003，頁 139-176。孟子更提出「不忍人之心」以說明我對他人的苦難所自發的道德義務。宋儒程明道進而提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說，以見「仁道」之涵概對一切生物之同情共感而成為一共同生命體的意義，成為儒者的共識。仁心或不忍人之心是指人之道德價值的根源所在，有如康德所提之「自由意志」作為道德法則的根源之說。在生命倫理學中，仁心或不忍人之心涵蓋一般所謂「仁愛原則」與「不傷害原則」。本文在此不能詳論，請參考李瑞全 1999。

兩難」。在現代社會中，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以及私隱和公義，都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法律與道德規範。但我們也知道，在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中，彼此和所涉及的公共空間的安全，以至人道的要求也是公共生活中重要而必須有的道德規範。這兩者也常發生衝突而有難以解決的取捨。在公共衛生的倫理之中，更常表現為嚴重的道德兩難。在同情共感之下的仁愛原則，使我們不但有理由必須考量我們的行動對他人的傷害或利益，也是我們守衛個人權利的依據：侵犯一個人的自由自主的權利，是對一個人的嚴重傷害。但個人的權益也必須在其他人具有的平等的權益不被犧牲之下才相對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其他人可能因為我們的自由權利的行為而受到傷害，公共安全的要求常是受到更多支持的。³在儒家的觀點來看，我們對他人不但有公民的義務，而且此中有一人類一體的關係在內，而我們的仁心所要求的並不限於特別關切的家庭關係，反而是要求我們把家庭關係延伸到在同一生活社群中的其他人，救助他人實是我們自然和應有的義務。家人是一體的，但仁心的推擴出去，則宗族是一體的，社會也是一體的，以至天下人類也都是一體的。此即表示在涉及他人的巨大災難性的傷害之中，我們是有互相救助的道德責任的。此中的義務與責任是多重的，具體如何衡斷，自然不是容易確定的事。我們先依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的事實，建立一些可以用來分析此中的兩難和建立的初步義務。

「仁」指我們對他人的生命之不安不忍的同情共感。仁心的感受固然始於在共同生活中對父母家人所自然而有的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憂樂與共的一體之感，家人就是一共同的生命體。家人生命如受隔斷割離，我們必有最深的哀傷。儒者最期待的「仁政王

(3) 在公共安全與個人自由權利的衝突中，如何解決此中的道德兩難，在美國有一典型的判例，基本上是支持當事人的行為會損及他人的生命時，公共安全可以壓倒個人的自由權利。詳請參考閱 *Tarasoff v. Reg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17 California Reports, 3rd Series, 425. Decided July 1976)一案例之主流與非主流法官之申論。此一案例和判詞在多本生命倫理學專書中都有引述，其中一個引述請參考 Tom L. Beauchamp and James F. Childress, 1983, pp. 281-284.

道」最基本的是能使人民能「養生送死無憾」。但儒者同時認為這是全社會，全國，以至全天下人，人人都應該得享的天倫之樂。因此，仁心也必一步步推擴開去，涵蓋社會、國家，以至天下人，所謂「仁以覆天下」的大同世界。而且，仁心不但對同為人類的生命有所感通，對一切生命都有所感通，都會有願其生而不願聞其死，願其全而不願其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在指出這種生命感通而有的一體的真實感受。

在面對來勢洶洶而又不知其底細的病毒，不但自己親人會受害，社會整體也不免遭受同樣的傷害，病以至於死。因此，仁心在此必以切身而又審慎恐懼的態度來理解此一病毒和作出最佳的回應，不敢掉以輕心。換言之，在追求「養生送死無憾」而又未知病毒之情況下，我們應「戒慎恐懼」而依「警慎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或「敬慎原則」⁴而行。因此，為了避免疫情出現不可控的災難，我們每個人都應盡力避免疫情發展到生死抉擇的道德兩難的情況。在此原則之下，我們自己固然應戒慎恐懼來行事，我們也要當事人或政府及早做出完備的預防，此即在公共衛生行動上應有「超前部署」⁵，以預應未來高風險的審慎決策和行事。這一「敬慎原則」在個人和家庭上也是必有的道德守

(4)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一般譯為「審慎原則」，但此譯混同了 principle of prudence，而且減煞了它的道德義務的內涵。作為公共衛生的倫理原則，它也是對我們處理公共衛生事務的一個道德原則，而且其中含有一種警惕危險與謹慎行事的要求。本人之前曾譯之為「警慎原則」，而在儒家的行事中，它更是帶有對不可知命限的「戒慎恐懼」的感受，對無條件的莊嚴的道德命令的「敬畏」(reverence)，對生命受傷害與人力時有所窮，而不免面臨生命之死亡，所以名之為「敬慎原則」，或更能表示儒者在此對生命的愛護痛惜與自我的道德要求的意義。

(5) 這是台灣在防疫工作中常用的詞語。在武漢傳出新的有感染性的病毒出現之初，國際著名的 John Hopkins 醫學研究中心曾預測第二個爆發的地區將會是台灣，因為台灣與大陸有非常緊密的人流與物流的流通，必定有由多種途徑往來而受到感染。但最後在先進的國家地區之中，台灣卻是唯一幾乎完全沒有受到疫情傷害的地區。台灣在防堵這次新冠病毒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由於主其事者的專家真能兢兢業業，做出很多預先的部署，即「超前部署」的防堵工作，使疫情的災難性的爆發不出現，並能維持社會和經濟活動雖不免有所降低，但仍能持續運轉不息，避免發生許多歐美等醫療體制完善的先進國家出現的大量感染而剎時間使醫藥與醫護人員發生嚴重不足的情況，而要決定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和補給，但免不了眾多醫護人員殉職，大量病患沒有醫療藥物可用而坐以待斃的慘劇。尤以老年人在痛苦之中孤獨地離開，不得善終，最使人深感生命之哀痛。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預先部署的工作詳情，請參閱 Jason Wang 2020。

則。面對如此嚴重的疫症，我們不能隨意而為，每個行動都應考量對防堵疫情的效果。因此，我們應聽從疫情專家的指引，共同合作，全力避免感染。而人傳人的病毒最容易滋長的場所是密閉和親密接觸的地方，家庭是最難以區隔的場所。因此，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加倍注意防堵的衛生行動，如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保持必要的社交距離、減少大小型的聚會等等，不但避免自己感染，也避免因自己感染而使家人受到感染，以至使其他人受到感染。這是「為己為人」的雙重義務。而在初期醫療資源不足，特別是口罩之使用，在疫情尚未大流行之前，不去哄搶和囤積醫療用品以至其他日常生活所需但尚用不到的物品，以免做成惡性的恐慌，徒生社會的爭奪和互相排斥。醫療資源不足時，應就有限的藥物做出合理的有節制的使用，保留資源給更需要的人，如醫護人員、日常必須上班的職員、進入工廠生產的勞工、在商場的營業員等維持社會日常所需的人去使用，避免他們受到感染，這是共同防堵疫情最重要的一環。這是「敬慎原則」中所含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團結互助的仁愛精神的表現。

進一步來說，仁愛不能止於只求自己，自己的家人，以至自己所在的社群中人之免乎災難即可以停止。仁心之感通，也必延伸到社會、國家，以至全世界。我們不但對於身邊發生的不幸事件會有強烈的感受，對於遠在千里之外的國家人民受到疫症的嚴厲打擊，也有惻隱不安不忍之情，也要求自己加以援手，減少傷害與傷痛。因此，當我們儲備足夠的醫藥資源之後，我們也要對受到病毒嚴重攻擊的地區的人們，全力支援。正如我們見孺子入於井而感受到要救亡的義務，此時實無分此孺子的美醜、性別、種族階級等等，更不應因政治、宗教之分歧而漠視他人的苦難。救災救難應純然是一「仁以覆天下」之情懷，使天地萬物都能免乎災難的至仁大義的精神。此即表示我們不能藉此災難去謀利，不止是不能去謀私利財富，更不能利用這個機會去操作政治的交易。對於落後貧困的國家，我們更應多加援助，不能只計算政治

效益。真正出於人道的救助，才真正是仁義的道德行為，才真能使受助者感動，感受到人間的溫暖和關愛。也許我們的救援或不能使病患避免死亡，但我們盡力救助的努力，對於家屬以及我們自己，也多少減除了一些遺憾。

這是我們從仁心之感通而有的對於疫症的傷害的人道回應和應有的道德行動的基本原則。此一理念可以涵蓋在公共衛生倫理中的各種當機而行的道德原則，如在公共安全與個人自由權利與隱私之間的按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而作的平衡，救助，由此而可引論如何平衡「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如何建立社會的信任，與政策的「公開」、「透明」、「問責」等等，以使全社會能同心合力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使傷害死亡減到最低。

三、個人與家庭之倫理與公民行動：

公與私之防疫倫理

如果以家庭(包含個人)作為一獨立的社會單位，與社會整體對於公共衛生倫理之回應方式，其中的道德區別有似個人權利與公共安全的對立。但這兩者實不必是相矛盾的關係。因為，個人或家庭作為私領域的場所，其中所具有的道德的涵義也必定與社會之領域相接而且重疊而不可分。反之，社會的公共倫理也必須以社會中所有人的權益公平地考量。個人或家庭沒有完全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倫理考量，社會也沒有獨立於社會中所有的人而有自己的權益。此有如杜威說：「個人是社會中的個人，社會是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社會與個人不可能完全分割。此在涉及社會所有人的病毒疫症中的倫理考量中是最明顯的事實。

我們必須了解瘟疫的嚴重情況是可以快速而幾乎是難以抵擋的傳染。我們固然要自身和家人做到最好的防堵疫症不要被感染的保護自己的工作，但同時也必須要保護其他人也不受到感染。我們不但不能「以鄰為壑」，更要進一步使最迫切需要相關醫療物資的人，如醫護和病人，或具有高風險以至缺乏物資的人，取

得必要的醫療物資，所謂「我夠用，你先取」這樣的一種互助互愛的精神，使社會能在和諧和團結之下合作，共同抗疫，方能真正減少傷害和取得最大的成功。這是使災難也可以成為社會最友愛和最有同情共感的世界，也更激勵起每個人的情志和發奮積極的精神。這是我們在流行病中最重要的共同對抗病毒，不分你我的一體團結精神。

在容易人傳人的疫症中，家人自是最容易和直接被感染的小群體。因此，防堵疫情的第一道防線是在家庭之內。這不止是一般說，「一人生病，一家生病」所表示的家人之間的親密的倫理關係的實情，而是客觀上最難以解脫的共同染上惡疾的情況。所以，在疫症流行中，常常是全家一同染病死亡。整個家族以至村鎮，也常因為是生活共同體，而不免全族與全村鎮全部死亡，以至鄰近村鎮都成為廢墟。因此，在防疫中，必須全家共同努力全力防堵，不能讓病毒有入侵的缺口。這顯示家人之間的一體同仁的關係。因此，在社會整體的防堵工作中，阻斷疫症的傳播，也是從病人的家屬作為最重要的追蹤檢測和治療的第一線，如此才能有效地防堵疫情的擴散。⁶

在疫情流行之中，個人在尚未染病之時，家人之互相支持自是最重要的關鍵。在感染之後，維持病人的日常生活所必要的資源，包括生活所需之經費，日常生活的食物、飲食與藥物的提供等都需要家人分工合作來共同分擔。除此之外，疫症的致命性與滔天蓋地而來的難以逃脫的命運，是最讓人產生恐懼而又無奈的處境，家庭的親子關係是最能舒解個人的孤立無援，坐以待斃的抑鬱無助的心靈痛苦。家人的互相支持，使每個人都有為自身與家人而勇於承擔，生命有奮發向上的動力，即使處在絕望的困境中仍然能努力不懈，克服各種困難，是對疫症最強的免疫力。如果在疫情擴大流行之中，家中有人受到感染，或疑有感染的風險，

(6) 台灣防堵疫情所以成功的一個因素正是開始防堵工作時，即以家庭為第一線的防堵工作而展開，檢測和追蹤家人和家人所接觸的其他人，因此，常常能很快而有效地追蹤到可能的受感染者，截斷社區感染的出現。

需要隔離和照顧，家人自是最能全心全力提供和分擔社會面臨巨大醫療照護缺口之時的照顧。雖然在家隔離實不容易做到完全足夠，但比諸單獨禁閉式的隔離，家人在心理與生理的支持上仍然是最有力的方式之一。縱使不幸，親人死亡，但病人與家屬在共同努力中共患難，共同付出，互相支援與慰藉之中分手，死者可以無憾，生者多少也減輕了家人離去的痛苦與遺憾。這種親情倫理的互相支援，是流行疫症中最能使人解慰的重要因素。

在防堵疫情中，家庭也必須得到社會的支援，不但在隔離中需要政府支緩各種生活和醫藥物品，在日常的生活資源上也需要政府全面的保底安排。由於疫情的流行，生活物資的生產會被停止，生活物品的流通會被限制，物品由於短缺而價格狂飆，等等，都必須由政府全面調控，以免人民與病人，以及醫護人員等受到更進一步的挫折與傷害，以至無法生活而挨餓受凍。因此，社會不但在保衛公共安全，也同時要保護每個人與每個家庭的安全，供應必須的醫療與生活物品。而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做好疫症的宣傳教育，和使疫情公開，以免民眾因不了解而產生許多不必要和非理性的反應，做成醫療資源的更嚴重的短缺和浪費。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防止病人或家屬，以至第一線的醫護和家人受到排擠和歧視。這時政府與負責和主持防疫工作的第一線的專家如何提供客觀而正確的疫症和疫情消息，如何隔離和治療確診的病人，同時保護病人和家人的隱私，都是防疫能夠成功，減低死亡，讓社會安心的重要因素。防疫的工作必須擺脫政治操作的干擾，使對治疫情的工作在運用專業的知識技能方面達到最佳的效果。否則，不但在疫情開始時會因為受不當的干擾而使防堵疫情的工作被延誤，在疫情改善時又因政治干涉而作了不適當的解封或放寬防堵工作，形成第二波感染，使疫情回溫而失敗。如此不斷反覆循環，社會與人民實受到更多的傷害。

由於防疫和對治疫症涉及公共安全和個人與病人的權益，一切疫情政策與工作都必須謹守：有效性、合比例原則、必要性、

最少干涉性與取得公開的支持。(Tom L. Beauchamp 2008, 631-640) 如此才可能得到民眾的認可和主動配合，防堵疫情才可能事半功倍，以最低的成本而成功。反之，人民因不解或誤解而不願配合，防疫工作必出於強制執行，也必產生許多不信任和反對的行為，造成防疫缺口和激發更多的社會對立。因此，在防疫工作上的倫理規範，我們要以民眾的信任和自動自願支持為最重要的原則。最能取信與人民的是，實踐上以救治和保護病人為第一優先原則，使病人和家屬得到最佳的照顧。防疫工作必須由專業醫療專家專責主持，作出符合當前對疫症的了解而進行，拒絕任何政治的干涉。在資源分配上要保持公平合理，同時兼顧仁愛與不傷害的原則，最少地干涉個人與家庭的隱私，爭取人民主動自願配合，防疫方能成功。在公共安全與個人和家庭私隱上要取得適當的平衡，不能無限擴張公共權力的使用，必須依合理的比例原則進行必要的保衛公共安全的政策和行動。

四、地球村中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防疫工作與 世界永久和平

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中，我們最重要的認知是「病毒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也生活在一個已不能完全分割的「地球村」，全世界已成為生活與生命的共同體。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實不足以區隔或阻擋病毒之傳播。在此，我們不可以因為不同的文化價值、宗教、意識型態，與各種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影響我們的抗疫的共同責任與工作。我們要了解在完全消滅感染和病毒傳播之前，任何地方的疫情都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生命安全。一切以謀取自己國家或政黨利益的行動，或利用他人受到疫情傷害而取利的行動，都是有違公義，都是無恥的行為。

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這次病毒的起源是一種惡毒的生化武器計劃而來的，我們沒有需要在現階段針對或指責任何個人或國

家。但涉及病毒的起源和已知的相關而重要的知識而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隱瞞或扭曲，自然對於全球因此而死亡的生命要負道德與刑法的責任。追究此一病毒之根源或來源，主要不在於追究由此造成的各種傷害，更重要的是阻止瘟疫的再次發生。由之前的多次的疫情經驗，我們都知道此事恐怕難有真正大白於天下的一天。但人類也應由如此一次嚴重的疫情取得教訓，做好各種預防措施，包括國際條約的規範，嚴格取締不當的科學研究實驗，如禁止旨在發展生化武器、隨意製造可能有極度殺傷力的細菌病毒，防止相關的實驗室設備不良與沒有嚴格規範的運作，使具有殺傷力的細菌病毒可以洩漏為患。我們應藉此次病毒大流行，作出認真的檢討，制訂全球研究的規範，高風險的研究計劃應盡量公開和透明，防止產生高風險和不符合道德規範的研究，等等。

這次疫情如此擴散，各國政府自然都有相應的政治責任，因而造成對防控病毒傳播失控和大量無辜生命的死亡，以及國民生活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這方面只能由各國人民來評斷和判決。但這次聯合國負責全球疫情工作的 WHO 實難辭其咎。WHO 的負責者明顯地是有私利和受到政治干擾而沒有做出及時的偵查、研判和預警，直至無法控制的全球大流行才撤回原初一直主張病毒的傷害性不嚴重，不需要認真防堵病毒的各種言論，如反對限制旅遊、不主張戴口罩、不必要減少大型聚會等等，誤導了世人，以至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遺害不知伊於胡底。WHO 的建立，和得到世人的支持和信賴，是因為流行病毒的傳播不是單一的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完全控制的事，而在現今地球村的情況之下，能為全世界進行預警和提供有效和及時的防控，是需要一全球性的跨國機構來主持，方較為有效。因此，WHO 方面的公信力必須重建，使全球對於未來的瘟疫有更好的預防和生命與健康更有保障。健康與疫疾是無分國界之事，各國也應全力支持和不可加以政治干預，否則必被全球人民所唾棄。

我們也必須認知，在防堵疫情和治療病毒的工作和研究，所得的成績並不是個別地區和國家所獨有獨享的。防疫經驗應該由全球共用和促進彼此更良好的互動與合作的事。病毒不分國界，猶如環境污染的傷害不分種族國界，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更應是跨越國家政治利益，共同合作和合力以赴的團結和博愛的基礎。此種成果具有跨國跨種族和文化宗教的共同利益，可以說是聯合國在推動全球和平合作的最好的一個機制。我們更應藉由健康與防堵瘟疫的傷害而尋求真誠的合作，真正是愛鄰如己，發揮人類高貴的仁愛與惻隱之心，為人類永久的和平踏出第一步。

五、反思與病毒共存的生命意義：一些哲學的啟示

病毒最不可思議的是：它不是一生命體，但卻具有複製或繁殖的能力(reproduction)。它似乎只有生命體最重要的兩種基本能力表現的一種，即只能繁殖而缺乏「生長」(growth)的能力。而它的要命的負面表現是它由宿主取得繁殖的資源之後會殺害宿主！所以新冠病毒對宿主來說全然是負面的，且在殺害宿主時使後者產生莫大的痛苦以至於死亡。但這種病毒在殺害宿主時卻也同時走向自己的消滅！站在人類的角度，我們自然要嚴加防堵和痛予消滅。但進一步的反思，讓我們意識到病毒與人類起源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病毒的存在，啟示我們了解的是，物質的東西似乎不純然只是物理性的東西，即，不只是具有物理科學所確定的各種物理的能量與能力。在自然科學之中，物理的東西，或確切地說物理的能量，是被假定為永恆不滅的。而一切轉變只是能量型態的轉換。如果我們接受宇宙最原始和基本的存在狀態就是如科學家所研究的原子、電子、粒子、能量等等的物理事物與現象，則這些物理的東西如何能發展成為有生命的世界，可以攝取周邊的物質和能源而不斷繁殖，特別是產生有思想意識和價值判斷的生命體，實是難以理解的。其中一個必須有的關鍵是什麼時候或什麼情況之

下，一堆無生命的物理的東西，會變成可以複製它自己的東西，即成為一生命體？病毒提供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當物理的東西達到某種結合的組織時，它會變成一種 DNA 的組合，而且能自我複製！如果單就組成 DNA 的成份來說，它們只是一些化學元素，終究也只是一堆物理的東西而已。但生命的奧妙就是這一堆化學元素的東西發展出生命！在我們能構想的宇宙發展的歷程中——暫且只從我們所知的大爆炸的時間開始，它如何在經過億萬年的發展中，發展出如在地球上所見的多樣化的物種和生命，以及最為難解的人類的生命，這是一個科學家所無法說明的現象。⁷在一個意義之下，這是科學所不能說明的問題，因為，科學的預設就是：這些基本的元素都是根據物理定律的因果方式轉變和演化的。其中並無生命的現象或能力在內。如是，我們如果不能滿意於物質只具有物理的能力，而一切生命來自物質的東西，則我們合理的推論是：生命的能力也同時存在這些最原始的物質之中，只是要具有相應的充足條件，這種能力才能發揮出來。生命產生和演進的歷程就是這些物質在各種適合的條件之下步步展現出它原初所具有的能力。一切生命可以說是如此的一種能力的表現。

原初能複製自己的化學元素的組合應是能永續生長發展的，一步步演化成為單細胞生命，再發展為眾多的物種，否則我們不會有現在那樣多樣化的生命。當然也有可能已有不少有複製能力的元素組合在此過程中出現但卻不能持續複製，因而斷滅。相對於最終能產生可永續的化學元素組合來說，病毒可以說是一種變

(7) 這種怪異的現象或異象(anomaly)在物理科學中也有一些類似的情況。科學界都知道「粒子糾纏」(particle entanglement)的物理現象存在而又是現在物理定律所無法說明的。所謂「粒子糾纏」的現象是指，當一個粒子分成兩半時，它們的「自旋」互相配合為「上旋」與「下旋」，當一者由「上旋」被改變為「下旋」時，另一者即會有相應的改變，即由「下旋」改變為「上旋」。最難解釋的是，當這兩個分開而且相隔很遠的粒子，其中一個的「自旋」改變時，相隔很遠(在光速能及時傳到之距離之外)的另一半即同時改變其「自旋」。參見蘭薩(Robert Lansa)與博曼(Bob Berman)合著，隋梵譯《宇宙從我心心生起》(臺北：地平線文化，2015年)，頁 80-86。這兩位科學家由此提出意識或心靈作為宇宙最根本的現象的說法。

異。病毒不是生命體，但可以依附在其他生命體的資源上繁殖，但在這個過程中，它卻同時殺害了它的宿主，因而消滅了自己繼續生長發展的基地和資源，所以，它的複製是不可能永續的。其中一個出路是它能夠寄生在一個它不會感染發病的宿主，而藉此宿主可以不定期地侵襲人類。另一個出路是經由 DNA 組合的變異，衍化出那些減低毒性的亞種，使自己能與宿主並存，只是在一些定期的條件出現時，它才會傳染給人類。如感冒在冬天時侵襲人類呼吸系統，造成大量感染，但受感的人只部份會死亡。因而成為與人類可以共存的病毒。

病毒這種特性，與人類某些行為極為相似。人類出於原始欲望的渴求滿足，因而以暴力的方式宰控一個地方和地方內的人群。暴君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為所欲為，但在過度的欲望之下，所控制的群眾會由於死亡或逃走而日益減少，結果不是被敵人消滅，就是被自己統治下的反對者所消滅。如果這種宰制式局面朝向開明方面發展，和日漸減輕暴力的統治，可能會形成可持續的循環，如一治一亂，而走向開明和最後成為真正合理而可持續的民主政治的模式，使社群的公共權力的安排可以永續，方可免除由於內部的不平衡和不公義而自我毀滅。

追求長生不老是生命本有的一種自然欲望，可說是古代的智者都在尋求這個答案。東西方各個大教都嘗試給人類一個解答。但病毒給我們的啟示是人類只能在可持續的繁殖與生長中實現生命的無限性。無限性與無限的價值只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而生命最奇特而又普通的表現，是生命之生生不息。這即是正面的創生原理所在。此即中國傳統所謂天道創生之生生不息之大德。人類也只能在不斷的創生中繁殖，但可持續的繁殖是在有自我約制的條件之下的繁殖，人類欲望過度的發展與滿足的追求，將必引致人類的自我滅亡。環境污染以至地球暖化，可說是人類欲望過度的表現之一所形成的對人類具有滅絕性的後果。在過度的欲望追求之中，人類的生命與生存將受到反噬，如不反省和減低欲

望的追求，人類將毀滅於自己的無限欲望之中。這是人類追求權力與宰控的其中一種表現。政治上的權力無限的追求與獨佔，也會毀滅自己，可能同時毀滅全人類！這可說是病毒或流行疫症給我們的教訓與啟示！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李瑞全：《儒家道德規範根源論》，台北：鵝湖出版社，2003，頁 139-176。
LEE Shui Chuen. *On the Source of Moral Normativity of Confucianism* (Taipei: Legein Publishing Co., 1999), pp. 139-176.
- 李瑞全：《儒家生命倫理學》，台北：鵝湖出版社，1999。LEE Shui Chuen. *Confucian Bioethics* (Taipei: Legein Publishing Co., 1999).
- 蘭薩（Robert Lansa）與博曼（Bob Berman）合著，隋梵譯：《宇宙從我心心生起》，台北：地平線文化，2015，頁 80-86。Robert Lansa and Bob Berman. *Biocentrism: How Life and Consciousness are the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Tru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translated by XU Fan (Taipei: Horizon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pp. 80-86.
- Beauchamp, Tom L. et al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8), pp. 631-640.
- Beauchamp, Tom L. and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81-284.
- Wang, Jason. et al. “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JAMA*. 2020;323(14): 1341-1342, published on JAMA Network, March 3, 2020.